

日本江户时代唐话辞书中的江苏元素呈现与再生产机制探析

李玉

宿迁学院，江苏宿迁，223800；

摘要：本文以《译家必备》《中华十五省》《徒杠字汇》《俗语解》四部唐话辞书为考察对象，系统梳理其中涉及江苏地理空间、人物活动、民俗传统及方言特征的资料记载，旨在解析这些辞书中江苏文化元素的表征范式及其语用价值。借助微观词条分析，进一步阐释江苏地域文化在唐话辞书中的体系化建构及其文化再生产逻辑。

关键词：唐话辞书；江苏元素；呈现；再生产

DOI：10.64216/3080-1516.25.12.040

引言

江户时代作为日本汉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其汉语教材编纂行为折射出日本对中国文化的系统性吸纳与再诠释。这些文献不仅是语言习得的工具，更是文化认知的媒介载体。笔者聚焦《译家必备》《中华十五省》《徒杠字汇》《俗语解》四部唐话辞书，在整体辞书编纂语境下，提取涉及江苏的词条进行细读，以揭示其文化书写背后的制度性动因。

在分析框架构建上，本文借鉴罗婳（2018）的辞书分类方法，将研究对象区分为唐通事教本类与非唐通事教本类辞书。基于此分类，本研究从辞书功能维度重构江苏地域文化的分析框架。

1 辞书功能类型

1.1 唐通事教本类唐话辞书

该类辞书产生于中日贸易交流的实际需求，具有明确的职业教材属性。其核心使用者为幕府委派的“唐通事”等通译人员，强调实用交际能力的培养，服务于港口管理等实务场景。典型如《译家必备》采用会话模拟、船务登记等体例，收录大量源自贸易现场的语料，其江苏相关条目不仅记载人物籍贯等基本信息，更折射出江户时代港口身份管理制度的运作细节。

1.2 非唐通事教本类唐话辞书

与之形成对照，《俗语解》等非唐通事教本类辞书主要面向日本文人学者，其语料多采自中国方志、小说等书面文献。这类辞书的核心功能在于消解词义理解障碍，其江苏条目常标注文献出处，注重语境还原与文化阐释。例如《徒杠字汇》对江苏民俗的记载，往往结合原文引文进行跨文化注释。

2 研究文本的编排逻辑与分析处理

本文所使用的《译家必备》《中华十五省》《徒杠字汇》《俗语解》均采用收录于《唐话辞书类集》（19

69）的版本。由于四部辞书的功能类型各异，其条目编排亦存在差异，并直接影响了语料的处理方式与分析策略。为保障研究科学性和可比性，本文在说明其编排原则的基础上，抽取四书中涉及江苏的条目加以分析。

《译家必备》将条目置于33个具体场景之下，以唐通事与中国人的对话为主要内容。除“初进馆”“牵送漂到难船”“护送日本难人”以外，其余场景基本上都与中国商船为通商贸易而驶入长崎港相关，涵盖入港、货物装卸与管理、来航人员在滞留期间的事务、船只修缮、领取信牌（通商许可证）以及出港准备等全过程，呈现出中国商船自入港至返航的完整流程。

《中华十五省》对十五省省情记载翔实，亦涉及省内各府信息。卷末列载中国商船船员称谓并释其职能，还提及妈祖信仰相关内容。

《徒杠字汇》采用“以首字笔画数为分类依据的单项排列法”，即根据词语首字的汉字笔画数顺序分为若干类。这一排列方式具有一定的工具性，便于查阅，但也导致语义相关的词汇在辞书中分散排列，缺乏内在逻辑连贯性。

《俗语解》（长泽本），共计五册，采用日语伊吕波排序（音序）与内容分类相结合的编排方式。

鉴于四部辞书编排方式的差异，本文在实际分析中并不拘泥于原辞书的编排顺序，而是结合词条内容性质和文化功能，对相关条目进行重新归类。这种处理方式一方面尊重了原始资料的排列逻辑，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揭示词汇使用背后的社会知识组织机制与文化书写功能。

3 《译家必备》中的江苏人物与制度呈现

3.1 《译家必备》中的江苏官员更替呈现

《译家必备》“唐船进港”部分收录了一则关于官员更替的对话记录，其中写道：

再问你江南浙江文武官员有陞转交代么

也不多 总督抚院是仍旧还在 换了一个按察两个巡道 苏州的太守年老了 辞职告退了 今新任了一个姓周的 他四五年前为一件事情革了 旧年仍旧起复 他本来清的官 不是害百姓的人 因有一个巡抚不对的参革了他 后来朝廷晓得他是个好官 起他来用的了。

《译家必备》中关于苏州太守更替的记载，不仅详述革职与起复的前因后果，还涉及官员品格与政务评价，内容超出了语言教材的教学范畴，呈现出政治通报与档案记录的特征。已有研究表明，该辞书中“初进馆”“领牌”等条目反映了长崎港务的制度性操作流程。此外，唐通事除翻译外，还承担贸易许可发放、人员登记与情报收集职能，这种记载方式很可能是日方基于实际行政需求而进行的信息再书写。

3.2 《译家必备》中的船员身份与登记呈现

《译家必备》“唐船进港”中还有一条记录写道：“寅年第九番厦门船主高隆元今将通船人众数年貌住址开列于后”，其中详细列出了随船前来的人员花名册，经笔者观察，其中有不少江苏籍人员，例如：

板主 林之榮 年五十一歲 微須 蘇州人 祀觀音
盧茂國 年四十九 有須 崇明人 祀三官
謝有祿 年三十歲 無須 蘇州人 全
雛如飛 年七十五歲 微須 蘇州人 全 祀媽祖
隨使 杜非甫 年十三歲 蘇州人 祀三官、媽祖
宋旺使 年十五歲 蘇州人 祀媽祖 三官

在《译家必备》中，涉及船员的相关条目普遍呈现出高度规范化的记录格式。这种结构化信息呈现不仅有助于语言学习，也极有可能回应了江户时期港口行政管理对人员识别与登记的制度化需求。笔者注意到，这类格式与幕末及江户中期大量关于漂流清船的“护送日记”在结构上极为相似。先行研究中，田中謙二、松浦章（1986）、松浦章（1989）、大庭脩（1990）等所整理的得泰船、安利船、南京永茂船、南京船元顺号等漂流船档案资料中，均对乘员信息作了结构统一的登记，例如：

船主 沈敬瞻 年四十二歲 蘇州 祀媽祖
財福 顧寧遠 年二十九歲 松江 全

这种书写方式表明，在涉外船务管理中，对籍贯、年龄、信仰等要素的规范采集，已经成为制度性需求。

另一方面，已有研究指出，《译家必备》中“初进馆”“领牌”等条目真实反映了长崎口岸的行政流程，其内容涵盖礼仪秩序、角色职责、物资出入与文书往返，远超一般辞书所涉范畴。而唐通事在制度上不仅担任口译笔译，还负责领牌发放、人员管理、通商控制与风说明书翻译等事务。长崎港在中后期实施的“信牌—基本台账—割符留帐”等档案体系，亦明确要求所有来航清船

的船员信息可比对、可追溯。正是在这样一个制度语境中，《译家必备》所记江苏人员花名册的规范格式便不仅具有语言学习的意义，更呈现出与港务治理体系之间的深度嵌合。因此，可以合理推测，在中日交涉与海关实务管理的背景下，该辞书在某种程度上已承担了辅助记录与信息通报的制度功能。

此外，名单中江苏籍人员较集中，尤其标注为“苏州人”的频率最高，这显示出江南地区在对外贸易从业群体中的重要地位。“崇明人”亦见一例，可视作江苏沿海岛屿居民的代表。

4 《中华十五省》中的江苏空间秩序呈现

4.1 《中华十五省》中的地理层级呈现

初步观察可知，书中涉及江苏的内容主要以府为单位展开叙述，包括苏州府、扬州府、常州府、崇明等。

《中华十五省》中有关江苏各府的词条，通常包括地名、户数规模、地理位置以及与日本的海上距离等内容。从文本结构来看，这些要素虽然在现代地理学意义上并不严谨，但在语篇功能上似具有对地域进行等级化与连通性呈现的作用。

4.2 《中华十五省》中的空间定位与交往距离呈现

《中华十五省》中多次出现“日本ヨリ海上〇〇里”的表述。从语义形式看，这种距离标注显然并非精准测量，而更可能是一种近似性的空间定位手段。笔者推测，这类“从日本出发”的空间标记，不仅传递了江苏各地相对位置的信息，也在隐含地建构一种以日本为参照中心的交往可能性图景。通过将苏州、扬州、常州等地纳入“易达一邻近”的想象框架，《中华十五省》可能在学习者心中生成了一个层次分明的“可交往空间”，从而提升其地理熟悉度与文化接触频率的认知基础。

4.3 《中华十五省》中的经济与人口表征呈现

上述有关江苏各府的词条普遍包含“户数”量化表述（如“戸数凡六万軒ノ所也”），这类数字符号不仅构成经济规模的隐喻性指涉，更塑造了学习者对地域繁荣的认知图式。笔者认为，此类“户数”记载并非精确的统计数据，而是通过数字修辞建构江苏城市的经济意象。这种数字化书写有效激活了人口密集与经济发达的空间想象。

4.4 《中华十五省》中的历史文化标签呈现

部分条目嵌合历史人物注记（如“常州府…周泰伯ノ居所也”），这类标注兼具文化说明与象征建构双重功能。笔者认为，“古贤居所”式书写实质是通过历史权威提升地域的文明能指，使其从地理坐标升华为文化价值载体。这种符号化操作强化了地名的伦理维度，促

进了文化认同的形塑。

5《徒杠字彙》中的江苏苏州民俗与节令呈现

作为按汉字笔画编排的唐话辞书，《徒杠字彙》收录了大量苏州地域词条，其显著特征是频繁引用《清嘉录》文献。这表明编者可能有意强化辞书的地域文化覆盖。

5.1《徒杠字彙》中的节令与信仰民俗呈现

以《清嘉录》为文献基础，该辞书收录了众多关于江南食俗与节庆实践有关的词条。例如：“青團”“年糕”“年夜飯”。更值得注意的是，该辞书还收录了与辟邪民俗相关的词条，例如：“貼天師符”等。

虽然这些词条初衷并非文化记录，但其保存的祭祀与饮食实践，确与清代江南岁时传统形成互文。从辞书编纂视角看，这类转写既服务语言教学，也意外成为文化记忆的载体。

5.2《徒杠字彙》中的岁时娱乐与表演艺术呈现

此类词条主要记录了江苏（尤其苏州）地区在岁时节庆期间的民间娱乐形式，包括灯谜、戏剧、灯具等，体现了地域性的岁时文化与艺术传统，例如：“打燈謎”“走馬燈”“彈壁燈”“青龍戲”。

笔者推测，这些条目的选择可能与江南地区（尤其苏州）在元宵、中秋等传统节日中形成的丰富表演文化相契合。虽然辞书本身未对地域出处加以明确标注，但结合词义和历史文化语境，不难看出其所映射的正是江南地区特有的节俗形态与文人雅趣。

5.3《徒杠字彙》中的日常器用与家庭风俗呈现

此类词条所涉及内容大多与家庭日常生活与节令行为相关。例如：“瓶洗”“盆景”“拜春”“拜牌”“送竈界”“做夜作”。

笔者观察到，这些词汇虽无统一语义标签，却在文化实践层面体现出强烈的仪式性与时间性特征。尤其“送竈界”与“拜春”分别对应除夕祭灶与立春贺岁等典型节令行为，反映出苏州传统社会中家庭礼俗与岁时循环之间的紧密联系。笔者认为，这类词条虽属日常用语范畴，其进入辞书后已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传递功能。

6《俗语解》中的江苏方言与社会认知呈现

《俗语解》收录了大量来源于笔记、小说、地方志的方言与俗语词汇，其中部分条目涉及南京、苏州等地的地域语言特色。笔者在分析其中与江苏相关内容时注意到，部分语词来源于特定场所，使用语域具有一定特殊性，尤其是引自《金陵六院市语》者，其语言形式、指称逻辑和词义替换方式与一般方言有所不同，推测应

当属于特定交际场所中内部流通的隐语系统。

6.1《俗语解》中的地域方言呈现

如“把總”“郎中”“丫頭”等词，均出现在《俗语解》的南京、吴中相关词条中，所附引文多引自《金陵琐事》《辍耕录》等地方笔记。笔者观察到，这些词虽源自日常交流，但在表达中显现出显著的地域性职业或身份标识功能。例如，“把總”虽为军职名，但在南京土语中指工头，词义转化反映了语境中职业称谓的地域差异；“郎中”作为医生称谓在南京使用频繁，而“丫頭”在吴中语境中则暗示性别与地位。这类词汇虽形式通俗，却折射出清代地方社会中语言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复杂关系。

6.2《俗语解》中的风月场域隐语呈现

与上述地域性方言不同，《俗语解》中所引《金陵六院市语》呈现出另一种词汇系统，其特点是大量采用替代性称谓，用以描述身体部位、饮食行为、身份角色等。如“撒撋”意为“头”，“訕老”指饮茶者或常客，“插老”指簪子，“剪列傑”用于称呼少年，均与一般方言表达方式明显有别。笔者认为，这类词汇可能源自风月场所（如妓馆）等特定空间中的日常交际，其语义替换显现出明显的隐语属性，既服务于内部识别，也起到一定的语义遮蔽作用。尽管《俗语解》未对这些用语的语域加以标注，但从词语分布、内容构成以及所引文献的空间指向来看，有理由认为这类语言主要流通于具有高度交际专属性的特定语境之中。

7唐话辞书中的江苏文化再生产

7.1知识结构与文化分类

尽管各部辞书的功能定位各有侧重，但它们在编排内容时仍显现出有意的文化编排逻辑。唐通事教本类辞书《译家必备》所收录的江苏条目，如苏州等地人员花名册、官员变动记载，不仅用于口语训练，还可能服务于通商管理与政治情报收集，反映出“知识江苏”的实用性属性。相比之下，非唐通事教本类辞书《中华十五省》《徒杠字彙》《俗语解》则多采自笔记、民俗书写等，围绕节令、风俗与方言建构出一个“文化江苏”图像。这种区分虽未在既有研究中被明确提出，但笔者推测它隐含于辞书的编排意图中，形成一种“知识—文化”双重层次的再现。

7.2语域意识与社会再现

唐话辞书的语言选择不仅体现了语言教学的目的，也折射出编者对语境、阶层与社会身份的主观意识。以《俗语解》为例，笔者注意到其中江苏方言词条与来自《金陵六院市语》的风月隐语词条并置出现。这种语汇混用现象表明，辞书在语言收录中尚未统一语域划分，

而是将日常用语与特定场所用语共同呈现。笔者推测，在这样的编排中，辞书文本实际上压缩了地域语言所携带的社会信息，使其成为一种高度浓缩的“社会语境再现”模式。这种压缩式表达，既方便学习者快速掌握词义，也可能在潜移默化中传达了有关中国地域社会结构的多重认知。

7.3 从“交际媒介”到“文化教材”的功能转变

早期唐通事教本类辞书多用于对华贸易、港口交涉、人员管理等外交实务，是典型的“实用交际工具”。到了江户中后期，随着汉学的发展和文人阶层学习需求的提高，部分辞书（如《徒杠字彙》）逐渐纳入大量与岁时节令、风俗器物相关的词条。这些内容虽未必直接服务于口语训练，却有助于学习者理解中国文化语境。笔者推测，这一变化反映出唐话辞书逐步向“文化教材”转型的趋势，其对江苏文化的再书写正是这一演变过程的直接产物。

7.4 再语境化的知识建构

综合四部辞书中江苏条目的语言特征、语义组织与文化内涵，笔者推测，这些内容本质上是一种“再语境化”的行为。无论是通过《译家必备》中的通商场景构建出的“制度江苏”，还是通过《徒杠字彙》与《俗语解》中的风物方言塑造出的“文化江苏”，这些词条所构成的并非现实社会的完整再现，而是依据学习需求、辞书功能与文化想象所建构的“可识别的文化模型”。这一模型既体现出辞书时代的制度局限，也揭示了语言教学与文化编码之间的互动机制，是唐话辞书中“江苏文化”再生产的重要基础。

8 结语

本文选取《中华十五省》《译家必备》《徒杠字彙》《俗语解》四部唐话辞书中的江苏相关条目，考察了江户时代日本学习者在语言学习与文化理解双重需求下，对“江苏”这一地域所形成的语言文化认知。通过对制度性条目、民俗类词汇、地域方言及隐语系统等不同类型语料的整理与分析，笔者观察到，“江苏”在这些辞书中不仅作为一个行政地理实体被呈现，更逐步转化为一个被语言化、范畴化与文化化的“知识单位”。

这一“知识江苏”的构建过程，并非源于某一类辞书的单向陈述，而是多种辞书基于不同编纂目标与知识框架，对江苏文化元素进行选择性加工与功能性组织的合成结果。笔者注意到，《译家必备》通过对苏州官员、商船人员的记述，建立起一种以制度管理为主轴的江苏人群认知图式；《中华十五省》通过“户数”“海上距离”“历史文化标签”等关键词，将江苏府治纳入以日本为中心的地理想象结构，并辅以“常州为周泰伯之居

所”一类文化标注，强化了江苏在历史文化谱系中的象征地位；《徒杠字彙》与《俗语解》所涉条目则更具文化生活导向，从节令、器用、饮食、礼仪、信仰到地域方言，勾勒出一个细腻而生活化的“文化江苏”图像。

综合来看，四部唐话辞书对江苏地域文化的再生产，是一个贯穿资料选取、条目组织、语义归类与文化编码的复合性过程。其结果不仅为江户时代日本学习者建构了关于江苏的多维文化想象，也反映出中日文化交流中文本生产机制、知识结构意识与地域想象能力的互动关系。

参考文献

- [1] 罗婳.《唐话辞书类集》及其所录词汇研究[D].上海师范大学,2018:4-20.
- [2] 長澤規矩也(编).唐話辭書類集[C].汲古書院,1969:48-667.
- [3] 喜多田久仁彦.『譯家必備』の第1項目「初進館」について[J].研究論叢,2020(95):1-20.
- [4] 田中謙二 松浦章.文政九年遠州漂着得泰船資料—江戸時代漂着唐船資料集二一[M].関西大学東西学术研究所,1986.
- [5] 松浦章.寛政元年土佐漂着安利船資料—江戸時代漂着唐船資料集三一[M].関西大学東西学术研究所,1989.
- [6] 大庭脩.安永九年安房千倉漂着南京船元順号資料—江戸時代漂着唐船資料集五一[M].関西大学東西学术研究所,1990.
- [7] 張照旭.唐船貿易における唐船の出航地と唐船乗組員の出身地について—明治初期中国語教育の背景—岡山大学大学院社会文化科学研究科紀要 2014(1) :77-94.

作者简介：李玉(1989.12.31)，女，汉族，山东济南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化、中日比较文学。

基金项目：2023年度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一般项目“日本江户时代汉语教科书中江苏形象的建构研究”(2023SJYB2351)；2024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地方志专项课题“江苏方志在日本江户时代的流播与利用研究”(“24SFZC-11”)；宿迁学院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项目“明清时期日本汉语教材中的江苏形象构建”(校2022XRC035)；宿迁学院高级别纵向科研培育项目“明清时期日本汉语教材中的中国形象建构”(校2022XKYJ012)；宿迁学院高级别纵向科研培育项目“日本江户时期汉语教材与明清小说海外传播的关联性研究”阶段性成果。